

《東華漢學》第 13 期；173-19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1 年 06 月

遠方的戰爭： 論《睡眠的航線》中的生態、夢境與記憶

黃宗潔*

【摘要】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一書，以「睡眠」和「生態」為媒介寫歷史記憶，可說為台灣家族史小說的書寫開啟了新的航道。本文想要討論的，亦即這兩個元素的介入，對於作者想要處理的歷史記憶和戰爭主題有何特殊意義？全文共分兩個部分加以論述，先從小說中對「非人界」（包括動植物和菩薩）的敘述，探討生態學的知識和「神」的介入與戰爭主題之關係；再論述「人」的睡眠與夢境，如何在這場關於戰爭及災難的敘事中，召喚出那段壓抑與失憶的歷史記憶。人與「非人類」的角色，不只共同交織《睡眠的航線》觀看歷史的稜鏡，也體現了在面對無以名之，無從敘述的歷史創傷時，生命尋找出路的各種可能性。

關鍵詞：吳明益、睡眠的航線、歷史記憶、生態書寫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以小說記憶父輩歷史的「家族書寫」，在台灣文壇上漸受創作與研究者之重視，吳明益《睡眠的航線》一書，以「我」奇特的睡眠疾患和「三郎」於戰時前往日本當少年工的兩條主要敘述線並行的方式，交織出我與父輩的成長記憶，似乎亦可歸為此類「家族書寫」系譜之一員。若就本書處理的主題觀之，這樣的分類亦無不妥，但卻容易因此忽略作者更大的企圖與獨特之處，那就是結合「生態書寫」與「歷史書寫」的筆法。如邱貴芬所言，本書「從自然生態視角度拉出一條超越個人和家族生命史的軸線，對戰爭與人類文明的進程提出其獨到的觀察與見解，開發出台灣小說創作的一條特殊航道。」¹《睡眠的航線》以「睡眠」和「生態」為媒介寫歷史記憶，確為台灣家族史小說中前所未見的手法，本文想要討論的，亦即這兩個元素的介入，對於作者想要處理的歷史記憶和戰爭主題有何特殊意義？作者是否想要藉此拉出一個更高的視野來看待存在的議題？其中又隱含著什麼樣的史觀或倫理觀？換言之，吳明益為何要用生態和睡眠來書寫戰爭？這樣的視野是否可以提供某些不同的，面對戰爭、災難和創傷的態度或超越的可能？將是本文主要思考的方向。

筆者以為，《睡眠的航線》真正要處理的，其實是戰爭。因為小說中一切記憶的建構，都受到戰爭此一巨大外在環境的影響，個人私我的生命經歷、信仰與價值，遂不能自外於大歷史的敘述而存在。但是，成長於70年代的「我」和作者，畢竟是不曾親身經歷過戰爭的一代，他所查證與書寫的，無可避免仍是由想像所建構的戰爭。若較之生於戰亂、

¹ 邱貴芬，〈面對浩劫的存活之道〉，收於吳明益，《睡眠的航線》（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頁13。

長而離散的齊邦媛、王鼎鈞等作家書寫戰時回憶的作品²，就可清楚看出本書之所以出現如此大量宛如謄寫自歷史文獻的資料——比方說戰時由哈普少尉領航的軍機所投下之M-47燒夷彈的特色與造成的燃燒區域³、或是「我」至大和尋找二戰和父親留下的痕跡時，那段洋洋灑灑的日本二戰軍機史⁴——或許正是因為作者也清楚意識到：「我們都是沒有經過戰爭的人，我們根本不曉得戰爭是怎麼一回事。」⁵因為未曾親身經歷，無從敘述「主觀感受」，只能盡量訴諸「客觀史實」，卻也必然導致「疏離感」的產生。疏離，卻無從迴避，因為「我們確確實實是曾經經歷過戰爭的那群人所生下來的一代。」⁶於是，為了「修補戰爭記憶的空缺」⁷（或者說創造新的記憶之可能），「睡眠與夢境」於焉成為小說中最核心的「主導動機」⁸，但除此之外，生態意識和「神」界的介入，更是吳明益書寫戰爭、解釋歷史別出機杼之處。生態、神和夢境，共同構成了《睡眠的航線》之基本關鍵字，它們是吳明益為戰爭提出的解釋，為痛苦尋求的出路。以下將分為兩個部分，先從小說中對「非人界」（包括動植物和神）的敘述，探討生態學的知識和「神」的概念之介入與戰爭主題之關係，再從「人」面臨的睡眠困境，思考夢境與記憶的關係。⁹

² 可參考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王鼎鈞，《關山奪路》（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

³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146-147。

⁴ 同前註，頁194-197。

⁵ 同前註，頁254。

⁶ 同前註，頁254。

⁷ 邱貴芬，〈面對浩劫的存活之道〉，頁14。

⁸ 莊裕安，〈長夜漫漫夢迢迢——評吳明益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文訊》第261期（2007.7），頁102。

⁹ 必須說明的是，此處以「非人」和「人」進行區隔，並非意在強調小說中「非人類的觀點」和「人的觀點」有所差異，因為這些被作者所創造出的「非人類」角色，其觀點自然仍是「人」的投射。因此筆者所欲探討的，乃是作者對非人類角色命運的描述，或想像的視角，和其欲處理之戰爭主題有何關聯，以及這樣的處理方式，如何成為一種思考人類命運的可能出路。在此亦感謝匿名審查人針對本文中「生態」、「神」與「人」界線區隔方式所提供

二、生態、「神」與歷史

吳明益曾經提過，在小說中將生態議題納入的理由：「我發現很多的自然科學家，『勢必』要碰觸到人類歷史、自我意識、藝術、宗教等人文疑問，因此我認為或許可以從自然、或『神』的觀點來超越人解釋歷史時的種種困境。」¹⁰此處他將「自然」和「神」的觀點並列，已清楚點出小說中兩個值得觀察的「非人」界視野，前者包括包籜矢竹的開花、「我」小小的水草缸、多摩動物園中的動物們，還有最重要的，被作者賦與特殊力量的，那隻名叫「石頭」的烏龜；後者則以「觀世音菩薩」為神界的中心。透過這虛擬的「非人類」視角，我、三郎、石頭與菩薩，宛如萬花筒中的碎片，共同交織出《睡眠的航線》觀看歷史的稜鏡。

（一）生命自會尋找到出路？

在自然生態的部分，最具象徵意涵的，自然非烏龜「石頭」莫屬。吳明益筆下的「石頭」，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在宮本輝小說《春之夢》中，那隻在暗夜中被主角哲也不慎釘在柱上的蜥蜴「小金」。生命力強韌的小金在哲也的餵養下活了下來，悲慘地活著的小金，卻成為哲也認同的對象與生命力量的來源。哲也曾在困頓之中，夢見自己變成了蜥蜴，在生死間流轉：

熾熱的陽光燒在背上的感覺、被草上露水沾濕、岔開四肢感到土壤濕潤的情景、被一隻伯勞鳥銜在空中的恐怖感等，仍然感覺得出來。因飢餓和乾渴而死、被不知名的生物吞食而死、被人類的小孩亂棒打死。死了好幾次，又轉世好幾次。讓人不由害怕的時間，無疑地就這樣流逝了。實際上，只有四十分鐘。¹¹

的意見。

¹⁰ 黃宗潔，〈走過蝶道：吳明益訪談錄〉，《思想》第11期（2009.3），頁253。

¹¹ 宮本輝，《春之夢》（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72-73。

在宮本輝的筆下，人的生命就如同蜥蜴的生命，既卑微又強韌，在漫長的時間之河中，人和蜥蜴的生與死，又何嘗不都只是夢般的一瞬？烏龜「石頭」的生命力，比起小金毫不遜色，不過，相較於宮本輝以類似「莊周夢蝶」的手法來傳達哲學及宗教意涵；石頭之所以能夠活著，除了「身體異乎常理堅韌，充滿求生的意志力」¹²之外，更在於牠擁有做夢的權利，甚至，進入人類夢境的權利。

靠著壁面滲出的水、蚯蚓和蟑螂、壁虎為食，石頭堅毅地活了下來。被三郎的卡桑當成床腳的石頭，承擔著卡桑與多桑不同重量的夢境，而夢的重量必須自己也在夢中才得以消抵——如果設法遺忘，或許就能載得起現實生活中那無比沉重的苦痛與憂傷，牠於是盡量讓自己潛沉於深深的夢境之中。夢中無日月，空間的局限換來了彷彿永恆的漫長時光。如同烏龜自古以來就具有的象徵意涵：長生與永恆，石頭的命運亦與神話中龜背神山化為大地的形象遙相呼應。不只中國神話的龜足可成頂天之柱，埃及、印度與美洲也都有巨龜戴山或大地的神話，在初民的想像中，龜負神土，指向永恆不滅的宇宙，龜背上就是全世界。¹³小小的烏龜石頭，雖然是出於非自願的狀況，仍然繼承了牠神話祖先的力量，用無垠的夢土換取真實的空間，一肩擔起牠自己，以及卡桑和多桑的全世界。

石頭的遭遇和其夢中漫遊的能力，揭示了一個簡單卻重要的概念：時間是相對的。如同一瞬之夢亦能經歷累世輪迴，現世的漫長苦痛置於無限的宇宙時空中，亦不過眨眼之間。長與短、夢與真實、睡與醒、甚至死與生，一切概念都可交相指涉，而非二元對立。就像小說的最後，那隻死在階梯上的烏龜，眼睛半閉著，「彷彿未死，只是暫時睡著。」¹⁴進而言之，如果一切界線都可消弭，那麼人與其他生物的區隔亦如是。包籜矢竹、水草缸、動物園中的動物……，亦能同樣發揮指涉人類命運

¹²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58。

¹³ 鹿憶鹿，〈從神話到民間傳說中的龜〉，《東吳中文學報》第5期（1999.5），頁219-223。

¹⁴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288。

的作用。以包籜矢竹為例，竹子「開花」不只直接與「我」的睡眠「異常」相呼應，過去認為竹子開花之後就會死去的觀念，在書中也透過愛好生態學的人物「沙子」之口賦予新的解釋：「竹子用幾十年開花一次的方法讓自己活下去。只不過那個『自己』的定義跟人類不太一樣而已」、「竹子開花並不一定會全部死去，總有那麼一兩棵強韌的活了下來，……開花後沒完全死盡的竹子才是成功的竹子。」¹⁵看似異常甚至帶有死亡意涵的行為，背後可能隱藏著我們完全不了解的，生之訊息；就像被人類養在缸中，以強光和二氧化碳改變了生長形態的水草，雖在長期缺乏照顧之下看似「崩潰」，但只要「清理清理，恢復之前所設定的光線跟水質，應該就會再長出新草。」¹⁶易言之，當生態改變，生命的表現方式也會隨之調整，其中總會有那麼幾個強韌的，存活下來。

吳明益一方面透過包籜矢竹的「異常」行為，暗示了表象不等於真實，異常也可能是一種訊息，一種求存的方式——正如「我」必須藉由睡眠的異常現象方能面對不堪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開花意味著死亡，崩解卻可能重生，生與死在大化循環之中，本來就不是僵化的二元對立，如此一來，看似卑微的竹子和水草，似乎提供了一種超越災難與死亡的可能性——就算世界被戰亂蹂躪成焦土，生命仍究會想辦法找到出路。「在傷害裡面，仍具有存活的意義」¹⁷，正是創傷與災難最幽微的內在意義之一，亦可說是走出創傷經驗、重新出發的密碼。書中的生態敘述與戰爭歷史之間的關係，由此遂產生了一種連結的可能：烏龜、竹子與水草面對災難時的反應（無論是否具有主觀意志），展現了某種「生命本質」的巨大可能性，對於思考人類命運而言，自然有其意義。

¹⁵ 同前註，頁279。

¹⁶ 同前註，頁278。

¹⁷ 此為林耀盛2001年12月2日於「城市的災難」座談會上之發言，收錄於《中外文學》第30卷8期（2002.1），頁280。

（二）用生態學的眼光觀看歷史

但是，上述的說法若要成立，必須建立在一個更大的前提之下，就是將人與其他生物視為具有可比性，或者說，具有同質性。也就是把所有的物種皆視為宇宙整體生命構成的一部分，如此一來，人和其他生物相異之處自然幾希。書中「我」和「白鳥醫生」參觀多摩動物園的情節，就印證了這樣的想法。藉由「我」和白鳥醫生的對話，吳明益辯證了「人類終究也是一種動物」¹⁸，就像上野動物園曾經把B-29機員當成被捕的猛獸加以展示¹⁹，正是以一種扭曲的、人工化的方式體現「人是一種動物」的最佳隱喻。如果黑猩猩也會發動戰爭，人被關在籠中時也會恐懼和接受「豢養」，我們如何相信自己和其他動物之間存在著理所當然又巨大的差異呢？

當然，把自然環境視為一個生命體，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想法，是吳明益一以貫之的生態觀，故在此值得注意的，並非這種觀點的獨創性，而是它在《睡眠的航線》中所扮演的角色，足以提供另一種觀看歷史的途徑。這和陳玉峰所提出的「深層歷史觀」可謂不謀而合：

你、這個個體、這二十三對染色體的意義，它可是經過三十六億年來，無數的奇蹟所導致，當你對自己的生命有所認識，再看看一隻麻雀，一隻螞蟻，甚至一株草，任何一個物種，是否也經同樣的過程？……透過對生命的感知、詮釋所認識之歷史，稱為「深層歷史」、「深度歷史」。透過對生命演化的了解，感知到整個的生命史，該會覺得感動自己是上帝無窮奇蹟的產物。當有這樣的認知，則你對生命之體悟，將另有全新的看法，亦不會輕易去傷害其他生命。……從深層歷史學的觀點，找到一個生命體的意義、價值，會有不同的看法、詮釋，同樣地，也會重視、敬畏其他生命體，因為，他們也是多少奇蹟才演化出來的。²⁰

¹⁸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217。

¹⁹ 同前註，頁215-217。

²⁰ 陳玉峰，《台灣生態史話》（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頁11-12。

長久以來，人類將自己視為與眾不同的物種，天生萬物皆為我所用，但如果由生物學的眼光來看，人類和其他物種，都是由基因製造的求生機器，我們和其他生物在生命的起始點以及組成分子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由這樣的觀點推衍出去，除了導向如陳玉峰所言，敬畏其他生命體的深層史觀之外，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就是把基因的概念無限上綱，如同某些狂熱的達爾文主義者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就是試圖在人類文明的各種特性中找出「生物上的優勢」，並「把基因當成認識演化的唯一途徑」。²¹如此一來，只要我們認定某種基因較符合「優生的觀點」，是否就意味著可以（或應該）不斷挑選此種基因，將其他不合標準者淘汰？²²希特勒對猶太人展開的滅絕性大屠殺之「理論基礎」，不正是基於對日耳曼民族優越性的確信所產生的「種族淨化政策」？更接近的例子發生在1994年的盧安達，胡圖人在幾個月內屠殺了百萬左右的圖西族人口，起因是長期以來胡圖族被認為地位較低，無法獲得較佳的教育和工作機會。²³人類歷史上，無數的戰爭和不合理的種族屠殺，都可說是基於此種心態而產生的。

事實上，若以演化生物學的觀點來看，人類的所有行為（包括戰爭），的確都可以在生物學的架構中找到答案，例如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理論即為代表。但道金斯最核心的概念，雖然認為基因控

²¹ 理察·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著，趙淑妙譯，《自私的基因》（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290-291。

²² 但事實上，此種過度選擇某一基因特徵的結果，常會造成扭曲的演化。天寶·葛蘭汀曾以養雞場為例，說明「單一特徵繁殖」（single-trait breeding）造成的結果，養雞場不斷篩選胸肌厚實的小雞，結果小雞一度因為肌肉太厚實，雙腿無力承擔重量，導致跛腳或變形。「改良」之後，養雞場推出更強壯、肌肉一樣厚實的小雞，最後卻出現了會殺害母雞的「公雞強暴犯」。參見天寶·葛蘭汀（Temple Grandin）、凱瑟琳·強生（Catherine Johnson）著，劉泗翰譯，《傾聽動物心語》（臺北：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82-94。

²³ 參見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著，孫佩姣、陳雅馨譯，《路西法效應》（臺北：商周出版社，2008），頁32-34。

制生物的所有行為，且基因的本質是自私的，其動機只有一個，就是製造與散播更多的複本，就算是利他行為的背後，也仍是基因為了繼續存活下去的一種手段。不過他主張在「演化穩定策略」（ESS），也就是「由大部分族群成員所選擇，無可替代的最好策略」²⁴之基本原則運作下，「好人終究會出頭」。他以賽局理論來分析各種演化策略，認為「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善良寬恕特質，對基因來說仍是長久成功機率較高的策略²⁵，而當一個策略在族群中有多數個體採用，它就會一直很成功。在這樣的概念下，基因是了解生物行為的鑰匙，卻不致成為將「較劣等的存在」除之後快的藉口。透過基因理論，生物學和歷史看似產生了交集，也可成為對戰爭行為的一套詮釋系統，《睡眠的航線》一書中生態元素的置入，卻不只是為了將基因理論做為戰爭的終極答案。吳明益曾以道金斯「文化基因」的概念為例，說明人類行為雖然大部分由基因主導，但文化基因仍能改變人類行為的模式。²⁶也就是說，除了生物基因之外，總還有其他觀看與詮釋人類行為的可能，²⁷於是，他將視野拉得更高一些，試著從「神」的層次往下看。

（三）超越痛苦的幾種可能

若人類和其他生命在本質上的意義是相同的，那麼人類常見的巨大「我執」，是否就顯得微不足道？書中「觀世音菩薩」的段落似乎正足

²⁴ 理察·道金斯著，趙淑妙譯，《自私的基因》，頁107。

²⁵ 同前註，頁308-355。

²⁶ 見歐佩佩，〈吳明益——與二十年後的戰爭對話〉，《誠品好讀月報》第78期（2007.7），頁100。

²⁷ 例如社會心理學家，就認為大規模的屠殺來自於情境力量的影響，在去個人化、去人性化的情境中，將出現道德悖離與姑息的罪惡。以最知名的「史丹福監獄實驗」為例，在1971年夏天，心理學家邀請一群經過篩選，人格正常、健康、聰明的大學生隨機分為獄卒和囚犯兩組，打算進行模擬監獄生活兩週，後來實驗因逐漸失控而提早結束。見菲利普·金巴多著，孫佩紋、陳雅馨譯，《路西法效應》，頁40-41。

以佐證。對菩薩來說，「沒有任何痛苦與祈求是新鮮的」²⁸，更重要的是，對祂來說，所有的痛苦和祈求重量都是相等的。「即將溺死的人們與動物舉著雙手及前肢持續祈禱」²⁹，菩薩聆聽著那些祈願，無論是以祂為名或不以祂為名，無論是人類或螻蟻，在祂心中都是平等的。而祂如此慈悲，唯有選擇珍藏這一切祈求而不實現它，因為「凡人的願望多半相互干擾、矛盾，隱含著傷害性。……祂無法珍視一個祈求而傷害其他祈求，以致於祂決定珍藏所有以祂為名或不以祂為名的祈求。」³⁰菩薩不能落淚，因此菩薩低眉。

「我一直認為神一定很痛苦吧，尤其是掌管心靈或祈願的神，一定痛苦得不得了。（如果菩薩知道痛苦是什麼的話。）」³¹吳明益如是說。對於無邊無際的痛苦，沒有道理的暴力和傷害，人類沒有足夠的智慧可以理解，於是，人創造了神：

我認為宗教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心靈產物，用來面對無法解決的困境時，還有一個可能的仲裁或寄託的世界。在很多人的心靈裡，那個世界是最後的、不可崩潰的部分。戰爭中如果沒有那些「最後的信仰」，人類敏感的靈魂一定撐不下去吧。³²

世間有太多苦痛、災難、不平，沒有辦法以常理論斷，更不見得能用「苦盡甘來」、「黑暗過去總有光明」這類簡單的勵志語言自我安慰，事實是「戰爭的背後其實還有戰爭，而災難的背後仍將有災難。」³³但如果行善不見得積福，為惡也看不到報應，人要如何說服自己在巨大的苦痛中支撐下去？有這麼多事情我們無法解釋，人只好選擇相信，必然有一種更高的智慧能夠賦予這一切意義，現世無法得到答案的事情，神自有祂的道理。如果把一切的痛苦和心願交給神託管，卑微的此生就能找到

²⁸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42。

²⁹ 同前註，頁42。

³⁰ 同前註，頁134。

³¹ 黃宗潔，〈走過蝶道：吳明益訪談錄〉，頁257。

³² 同前註，頁257。

³³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295。

前進的力量。如同費修珊（Shoshana Felman）、勞德瑞（Dori Laub）在研究大屠殺的歷史時提到的，「大屠殺的歷史現實在哲學意義上來說是泯滅了召喚、陳情、回應他人的可能性，沒有一個他人可以以『你』相稱，能夠被以主體待之，因此創造了一個無法見證自己的世界。失去見證自己與從內部見證的能力，正是殲滅的真正含義。」³⁴而「神」，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正是在災難和戰亂中唯一可能以「祢」相稱的他者，是痛苦的唯一見證者，神的力量和指引，遂成為信仰和救贖的可能。

然而，不論是美好來生的「願景」，或是將痛苦磨難視為神所賦予的任務和考驗，在過渡到「彼岸」之前，既漫長又短暫的此生仍在。記憶捆綁著我們，要存活下來何其不易，於是，睡眠和夢境就成為在現實中逃逸的另一種方式。一如在夢中遺忘重量和痛苦的石頭。但是，用睡眠與夢境存活下來，必須冒著另一種風險，那就是夢境的土地會透過縫隙「滲透到真正的現實裡。那個縫隙帶著些微惡意，無言地存在。」³⁵「帶著惡意的縫隙」是夢境的陷阱——時間在夢中無限延展，使得一瞬亦如永恆，於是現實將被夢境稀釋，以致界線模糊。如此一來，沉浸在夢鄉過久的結果，是否可能意味著再也回不到現實之中？就像被釋放的石頭，早已不習慣用四肢自由行走，苦難的離開對牠來說，反倒「產生新的痛苦」。³⁶換言之，潛沉於夢境之中雖然可以消抵現實的重量，卻必須付出新的代價，這本「睡眠之書」看待睡眠與夢境的態度遂產生了某種曖昧性——夢境提供了某種救贖的可能，作者卻似乎希望與之保持距離，這樣的曖昧性在描述「我」的夢境與睡眠疾患時尤為明顯，夢境在這場戰爭與災難敘事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自然是解讀《睡眠的航線》最為關鍵的部分之一。

³⁴ 費修珊（Shoshana Felman）、勞德瑞（Dori Laub）著，劉裘蒂譯，《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130-132。

³⁵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262。

³⁶ 同前註。

三、睡眠、夢境與記憶

(一) 夢境的敘述：壓抑記憶的回返

以睡眠和夢境做為描述創傷、災難和記憶的重要管道，在文學創作中自非罕見的手法，以D. M. Thomas的著名小說《白色旅館》(*The White Hotel*)為例，此書描寫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創傷，但內容卻是透過女主角Lisa因性冷感、性幻想和莫名的疼痛接受精神分析的過程，書寫其夢境和回憶。雖然書中對於Lisa的疼痛乃是某種「預知死亡紀事」的超能力而非歇斯底里症狀的安排，常被視為作者對「精神分析的科學神話」之解構，³⁷但無可否認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思考夢境、創傷與記憶之間糾葛複雜的關係時，仍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對佛洛伊德來說，那些被我們所壓抑的記憶和願望，總會藉由夢境回返。因為夢最重要的意義就是願望的達成，但這些願望不見得見容於意識層面，於是夢只好透過各種「改裝」的方式來進行表達，那些使夢以其扭曲置換的內容呈現出來的深層動機，則是解析夢境時最重要的關鍵。他曾分析自己在一次鄉村小遊時的夢境，如何喚起他的童年回憶：夢中的他為了逃離一個學生聚會，跑入了一間高雅的套房，裡面的家具都是一種介於棕色和紫色的顏色，那兒有個看門的女人，他原本想避免與她說話以免被摒於門外，但她卻認為他的身分已足夠通行無阻。……之後他與一位瞎了一眼的老紳士置身於火車站內，他拿著一個男用的玻璃尿壺供老紳士使用……。佛洛伊德在解析此夢時指出，夢中的若干細節一方面顯示出他在清醒時一直抑制的「自大」，這個夢更與家人曾告訴他的一件童年軼事有關，當他兩歲左右，因尿床而被責備時，總會對父親說：「等我長大後，我要在N市買給你一座新的大紅色的床」；此外，在他七、八歲時，曾有一次因堅持要父母讓自己睡在他們的臥室，

³⁷ 阮秀莉，〈敘述和記憶／遺忘：從D. M. Thomas的《白色旅館》論書寫猶太人的問題〉，《中外文學》第25卷5期（1996.10），頁31。

父親罵了一句「這種男孩將來一定沒出息！」對年幼的佛洛伊德來說，這句話嚴重地打擊了他的自尊心，因此這樣的情景日後在夢中出現過無數次，而每次都不免連帶出現自己各種的成就與受敬重的景象，就像在對父親說：「你看，我畢竟是有出息的！」這童年的經驗解釋了夢中何以出現一位獨眼老人——出於報復，夢中的父親成了那副慘相，而在夢中照顧父親排尿，則是童年經驗（父親照顧小時候的他）之反轉，夢中獨眼的父親，現實生活中患有青光眼，而他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刀，正是佛洛伊德對古柯鹼研究的貢獻所促成。³⁸透過這個夢，佛洛伊德讓我們看到，夢如何透過各種曲折和偽裝的方式，和我們生命中那些幽微的記憶對話。

於是我們不難看出，再壓抑的記憶都有可能透過夢境的敘述而回返。但必須注意的是，在敘述的過程中，個案與分析師共同建構出來的，乃是「『第二事實』——最初的真相無從檢驗，精神分析以敘述使之成形的『記憶』，填補了這個位缺。」³⁹「敘述」對於召喚記憶，填補遺忘的缺口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如果碰到特殊狀況，這種透過敘述讓記憶回返的過程就會更複雜曲折。因為有時事件本身會具有無從敘述的特質，如同猶太人認為語言無法傳達大屠殺的歷史：「大屠殺不可敘述，無法敘述，無能敘述，故記憶無法容納。因為記憶有限而遺忘無窮，大屠殺的記憶只有遺忘能夠容納，記憶從遺忘而產生，但都是不足的演練，每一次敘述都是一次崩解，有待遺忘來修補。」⁴⁰關於大屠殺的研究，往往指向理解這場浩劫的困難，正在於其不可言說與無從翻譯的特質，如同法國哲學家克勞德·藍茲曼（Claude Lanzmann）那拍攝十年，

³⁸ 這個夢一共分成三個段落，佛洛伊德花了不少筆墨詳細解析了這個夢境的材料和來源，限於篇幅無法在此詳述每個細節，請參閱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臺北：志文出版社，2003），頁157-170。

³⁹ 阮秀莉，〈敘述和記憶／遺忘：從D. M. Thomas的《白色旅館》論書寫猶太人的問題〉，頁32。

⁴⁰ 同前註，頁31。

全長九個半小時的大屠殺見證紀錄片的片名「Shoah」一般，對於非希伯來語系的觀眾而言，「這部片子的名字沒有任何意義，像死亡一樣簡單，像驚嘆一樣漫長。」⁴¹但這看似沒有意義的片名，在希伯來文中原本是泛指任何一種大災難，現在則多半用來專指納粹造成的大屠殺，因為這空前的迫害與災劫，對猶太人而言，沒有任何其他災難可與之相提並論。「Shoah」的所有外語版本都保留了音譯而非意譯，正象徵著大屠殺經驗的難以翻譯。⁴²但這無從翻譯而註定敘述失敗的經驗，卻也無法輕易遺忘。想要重述的衝動難以阻止，那麼重述的內容究竟會以怎樣的形式展現？又應如何分析？以戰爭為主題的《睡眠的航線》，某種程度上正處理並回答了這樣一個「無能敘述」的困境——「我」一開始所面對的，正是奇異的睡眠疾患所導致的「無夢」狀態。

（二）無夢之夢：在失憶中創造記憶

小說初始，「我」就面臨著睡眠異常的困擾——睡眠時間頑固地不斷向後推遲，「既不是失眠也不是猝睡，只是睡眠的起始線邊倒退，一邊延長，想睡的這端無法抗拒，該醒的那一端也無法掌握，就好像駛進一個巨大的睡眠海洋一樣。」⁴³在這巨大的睡眠海洋之中，眠者無夢。「我」為此先後求助於台北的「宗醫生」和日本的「白鳥醫生」，透過「我」與醫生的對話，以及這場「尋夢」之旅，睡眠、夢境、記憶與歷史在此交會，讓「我」一方面治癒了自己的睡眠疾患，亦得以與父輩的歷史記憶接軌。但是，用睡眠和夢境填補記憶，其中的困難可能超乎想像，因為那有待補白的，並非「我」而是「父親」的記憶與歷史。這也正是吳明益為何讓「我」面臨無夢的處境，記憶既然無從藉由夢境回返，「無夢」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失憶」。而「我」對父親的歷史，同樣

⁴¹ 劉裘蒂，〈沒有一具屍體的現代啟示錄〉，收於《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頁5。

⁴² 同前註，頁5-6。

⁴³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30。

是一種「失憶」的狀態：「我有時回憶起我爸的時候，發現自己很難回想起什麼。說實在這點讓我感覺罪惡。」⁴⁴換言之，《睡眠的航線》中夢與記憶、歷史的聯結，其實是由兩者的匱缺來開展的。因此某種程度上，書中關於「少年三郎」（父親）的段落都可視為「我」的夢境：

透過夢境他看到了父親生前絕口不提的少年戰時經驗，看到了戰爭時菩薩的無可奈何、看到了烏龜如何被迫承擔原非它可以承擔的責任與苦難，那麼，「睡眠的航線」便是一個召喚失落的（台灣、父親的）記憶的過程，透過睡眠來修補敘述者「我」與父親生前無法溝通的鴻溝，為父親召回他壓抑的少年記憶，以成就完整的父親的人生。⁴⁵

以此觀之，《睡眠的航線》本身就是一個巨大夢境的鋪展。

然而，綜觀全書，不難發現吳明益看待睡眠與夢境的態度，其實頗為複雜曖昧。一方面此種將夢境、創傷與記憶連結的方式，很難不令人想起精神分析的理論，「我」在宗醫師打算觀察其腦電波時，也曾擔心「如果連夢境都不能藏匿些什麼，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藏匿的呢？」⁴⁶若對方真的可以從中解讀出什麼，豈不是連夢境這道心靈的防線都將失守？但另一方面，書中兩位醫師和「我」的對話，更多時候表現出的，乃是對理性科學的推崇和對精神分析的不信任感：

佛洛伊德很多地方都錯了，夢見貓可不一定代表母親。夢遠比他想像的複雜。我們很難從混亂的夢境裡解釋出清楚的理由，是因為夢本身大部分跟真實無關，而是大量的情緒跟象徵符號。簡單地說，根本不是佛洛伊德想像的那樣，夢是藏在某個地方，躲過大腦審核的情緒跟隱藏記憶……雖然這麼說有點殘酷，雖然有人喜歡解夢，但對我來說夢就是夢，是一些電波脈衝的反應。⁴⁷

⁴⁴ 同前註，頁136。

⁴⁵ 邱貴芬，〈面對浩劫的存活之道〉，頁13。

⁴⁶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96。

⁴⁷ 同前註，頁95-96。

「宗醫生」這段話，代表著科學界反對精神分析學派的典型見解，但宗醫生一方面認為「夢遠比佛洛伊德想像的複雜」，卻又用更簡化的方式說「夢只是一些電波脈衝的反應」，這樣的立場本身就不無矛盾。事實上，精神分析也絕非如同宗醫生所理解的那樣可以簡化成「夢見貓就代表母親」。精神分析是心靈的考古學，佛洛伊德主張古文物之所以出土時還可以保存原貌，正因為它是被「壓在下面」的，就像潛意識一樣，這些待挖掘的「真實」不但經常是被壓抑的，且是一種「心理真實」，換句話說，某些「真實」即使與客觀現實中曾發生的事件不全然相同，卻仍可能對於主體產生真實的（往往也是創傷的）效應，而夢便是發掘這些潛藏真實的一個重要管道；但夢的詮釋卻不是對號入座般尋找與夢中意象對應的符號，也因此佛洛伊德才一再強調：「同樣的一個夢對不同的人、不同的關連將有不同的意義」。⁴⁸

當然，小說人物的意見並不必然等同於作者的見解，吳明益亦藉由之後出場的「白鳥醫生」，提出一些和宗醫生略為不同的說法：

我認為神經系統科學所得到的一切研究結果，都忽略了夢其實還必須經過主觀意識的還原。沒有夢是不被『說』出來的，而當夢被說出來的時候，夢就跟做夢者的生活產生了聯繫，夢的敘述者會修改夢。我相信莎士比亞說的，我們是用與我們的夢相同的材料做成的，完全擺脫集體潛意識跟自己的人生經驗的人並不存在，同樣地，那樣的夢也不存在。⁴⁹

不過，事實上宗醫生和白鳥醫生在對睡眠疾患的解釋與看待夢境的態度，並沒有根本的差異，無論是宗醫生所描述的「time-free的睡眠」、circadian rhythm（全日節奏）、Zeitgeber（提供生物內在機制判斷何時睡眠與清醒的環境因子）⁵⁰；或是白鳥醫生提到的「睡眠暴力」、「快速動眼期睡眠行為疾患」、「發作性睡病及特發性中樞型嗜睡症」、「入

⁴⁸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著，賴其萬、符傳孝譯，《夢的解析》，頁50。

⁴⁹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219-220。

⁵⁰ 同前註，宗醫生對睡眠的解釋參見頁49-56。

眠期幻覺」⁵¹，都同樣是以睡眠醫學的語言和「我」進行對話。某種程度上，這隱然呈現了作者對於潛意識的迴避，但以全然理性科學的語言為「我」的睡眠障礙解套，卻又可能陷入另一種困境，如同莊裕安所指出的：這個兒子一方面「罹患『睡眠暴力』、『睡眠呼吸中止』這麼專業的疾病」，最後卻「讓失眠者、失夢者在野鳥之森跌一跤，就治好他的毛病」⁵²，實在不是「睡眠醫學」界會信服的結局。不過，筆者以為這個「小小的黑洞」⁵³，或許反倒是解決《睡眠的航線》書中關於歷史記憶補白的重要關鍵。

如前所述，《睡眠的航線》一書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乃是「我」如何面對父輩歷史，尤其是戰爭記憶的部分。從戰爭中歸來的父親是個沉默的見證者，重聽的他只能「生活在他的沉默世界裡」⁵⁴，戰爭表面上結束了，但事實上仍留存在他活下來之後的每一天：「每當三郎回想起他的少年時期，總覺得那段時間他被改變了什麼、植入了什麼，或者失去了什麼。直到晚年，他都在回想那種不太確定的未來，不太確定的身分，以及不太確定的哀傷。」⁵⁵那個燒夷彈轟炸東京的夜晚，「將永遠留在那些目擊者的記憶中」⁵⁶，卻也只能留在記憶中。歷劫歸來，他卻失去了述說的能力，在子女的眼中，他只是個沉默而嚴厲的父親，從不說那些關於自己的故事，「他在我的記憶裡一開始就是中年。」⁵⁷到最後，即使他想要述說，彷彿也已錯過了開口的時間和理由：「我們都知道爸有話想說，但是也都不願聽他講話。」⁵⁸面對一個失語的父親，「我」註定面對失憶的過往。他該如何憑空創造從未曾擁有過的「記

⁵¹ 同前註，頁209-211。

⁵² 莊裕安，〈長夜漫漫夢迢迢——評吳明益長篇小說《睡眠的航線》〉，頁102。

⁵³ 同前註，頁103。

⁵⁴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136。

⁵⁵ 同前註，頁162。

⁵⁶ 同前註，頁156。

⁵⁷ 同前註，頁93。

⁵⁸ 同前註，頁14。

憶」？儘管有無數關於記憶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記憶可以經由暗示誘發，從而將虛構的事件「植入」記憶之中，⁵⁹但如果有待補白的，不是一小塊記憶的缺口，而是被一個世代壓抑，被下一個世代遺忘的歷史呢？這正是何以「我」必須（回）到日本，只有回到父親歷史創傷的源起之地，建構記憶才成為可能。

在精神分析的概念中，被壓抑之物往往會透過「夢、症狀、付諸行動等形式試圖『重返』現在」⁶⁰，也就是所謂的「重複」（repetition）。如果將「我」一開始的「無夢」狀態視為一種最深的壓抑，那麼被「我」所壓抑之物將如同「未得到救贖的魂魄，它在找到解答與救贖之前不會安息。」⁶¹然而，父親的戰爭記憶既是屬於父親的過往，要壓抑或產生重複衝動的，也自然是父親本人。也就是說，「我」試圖壓抑的、必須解決的問題其實並非「戰爭」本身，而是「戰爭」所導致的，「我」的「沒有故事的童年」。⁶²因此「我」的大和之行，是為了找回那段空缺的，屬於「我」的故事，而這個故事追本溯源又必須回歸到戰爭，「我」遂在某種意義上替父親完成了原本應該由他進行的，透過「重複」創傷來療傷的歷程，這正是何以白鳥醫生「正巧」會在大和市的緣故——「這裡其實曾是二戰日本海軍重要的兵工廠與軍用機場所在地」⁶³，有著父親年少時的足跡。因此，乍看之下突兀的安排——在野鳥之森跌一跤就可以治療睡眠疾患，亦有了「解套」的可能：當「我」重複父親的旅程，並尋路找到立著「太平洋戰爭戰歿少年之慰靈碑」的善德寺之後，「我」已然回溯並正視了戰爭與家族之記憶，被壓抑的過往浮上水面，「睡眠暴力」導致的無夢與失憶狀態，遂不具有存在的理由。如同「我」對自

⁵⁹ 參見蕾貝佳·蘿普（Rebecca Rupp）著，洪蘭譯，《記憶的秘密》（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4），頁145-155。

⁶⁰ 尚·拉普朗虛（Jean Laplanche）著，王文基、沈志中譯，《精神分析辭彙》（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00），頁93。

⁶¹ 同前註。

⁶²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頁131。

⁶³ 同前註，頁188。

己睡眠「異常」的體會：「在那個睡眠『異常』的時態裡，我好像因此脫離了我的年紀與眼睛，因此看到了一些事。那也許是我這趟旅行最要緊的事。」⁶⁴當「我」發現自己能夠「看到」之後，那些透過潛意識所壓抑的、偽裝的事物，自然也就失去了力量。

其實，在大和之行的一週前，「我」的夢境已逐漸恢復，但「我」卻選擇不告知宗醫生，執意要完成大和之行，正凸顯了必須回到創傷源起之地，才有療癒的可能。夢境回返，「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有兩個戴著像是「飛行員風鏡」的男人，將十二頭袋鼠的頭一一砍下並丟入冰湖中，「我」和男人在袋鼠的臉上滑著冰。⁶⁵夢中並不隱晦的象徵符號——「飛行員風鏡」、「砍頭」，無疑都指向了壓抑之物的答案，正是《睡眠的航線》一書中最重要關鍵字：「戰爭」。⁶⁶

四、小結

「當語言、死亡與傷害在書寫中瀰散為虛構，惟有那場戰爭恆為真。」⁶⁷其實早在小說的敘述開展之前，吳明益已開宗明義地點出了《睡眠的航線》全書的旨要。那場戰爭恆為真，它活在每個人的記憶裡，但每個戰爭的倖存者，記憶它的方式卻都如此不同。就像Ian Buruma在研究二戰記憶時所指出的，德國人的戰爭記憶「彷彿是巨大的舌頭一而再、再而三地，所要找出一顆疼痛的牙齒」⁶⁸，日本人卻宛如得了「歷

⁶⁴ 同前註，頁255。

⁶⁵ 同前註，頁229-231。

⁶⁶ 「風鏡」在小說中對「我」而言，是個頗能具體象徵戰爭之物，文中尚有一段「我」在觀音寺旁購買「很有歷史感」的日軍飛行員風鏡之情節。同前註，頁250-251。

⁶⁷ 同前註，頁17。

⁶⁸ 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著，林錚顛譯，《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臺北：博雅書屋有限公司，2010），頁14。

史的健忘症」，會在啤酒館內唱著德國軍隊進行曲。⁶⁹「躲在廣島後面、壓抑、淡忘、甚至取消戰爭記憶，是日本社會最基本、最主流的態度」⁷⁰不同的戰爭記憶，幽幽訴說著各自「罪惡的代價」，台灣的戰爭經驗又該如何被記憶、被書寫？就算它終究要面臨「瀰散為虛構」的命運，在那之前，我們是否仍可能讓那些無法遺忘的創傷被撫平，讓瘖啞與沉默被傾聽？吳明益企圖延著「睡眠的航道」，帶領讀者回顧的，正是那段長期以來被壓抑的、失憶的歷史。

但是，這樣的探問何其艱難，小說中之所以堆疊出如此繁複的架構與視野，或許正因每一種詮釋的背後，都仍存在著巨大而難以弭平的隙縫——烏龜石頭所通往的神話世界、「天地不仁」的神的視野、宗醫生的科學態度，與友人「沙子」所代表的生態學觀點，這些不同的世界觀，固然代表了不同的詮釋系統之可能，彼此之間卻也存在著某種扞格與緊張性。⁷¹不同視野的交錯與拉扯，再再說明了「人」想要超脫命運與災難，想要賦予它一種解釋與答案的心情。這樣的努力或許未盡全功，但相較近年來其他家族書寫的作者常透過破碎殘缺之記憶片段來建構或消解歷史真理的方式，吳明益的做法不只讓此部家族史小說具有自成一格的特殊面貌，亦避開了傳統以單一敘事者發聲的家族史，可能造成的歷史觀之偏狹。而書中不論是烏龜石頭、包籐矢竹、或三郎一家人，都讓我們理解到，在災難和創傷的背後，生命能夠何其堅韌又何其卑微。小說結束在東南亞的大海嘯，數十萬的生命可以在一瞬之間消逝無蹤，但在無邊的黑暗之中，死生流轉，世界仍然會繼續。

⁶⁹ 同前註。

⁷⁰ 楊照，〈不散的戰爭記憶〉，收於伊恩·布魯瑪，《罪惡的代價》，頁7。

⁷¹ 此處感謝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意見，指出「天地不仁的神的視野與晚近內在於現代性的生態論之間可能的緊張性；烏龜石頭通向的神話世界，與現代的夢科學、夢的精神分析之間存在的緊張性」，是小說中值得注意與分析的部分。

A Far-away War: Discussion of Ecology, Dream, and Memory in *The Course of Sleep*

Tsung-Chieh Huang*

Abstract

Ming-yi Wu's *The Course of Sleep* which uses "sleep" and "ecology" as the medium for its writing of historical memory finds a new route for the novels of Taiwanese family history.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what significant meanings the two elemen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ubjects of historical memory and war with which the author wants to deal. In the first par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non-human world," (including animals, plants, and Bodhisattva) I will explore how the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are related to the subject of war; and then, I will consider how sleep and dream evoke the repressed and lost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narration about war and disaster. The characters of human and non-human not only interweave to form *The Course of Sleep*'s view of history, but also indicate the various possibilities of seeking solutions when living beings face the unnameable and inexpressible historical trauma.

Keywords: Ming-yi Wu, *The Course of Sleep*, historical memory, ecological writ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